

# 語言的殖民地

• 董炳月

毛丹青的〈旅日中國學者的雙語困惑〉<sup>①</sup>（以下簡稱〈雙語困惑〉）一文，觸發了筆者對「用外語寫作」這一文化現象的思考。不言而喻，這思考中積澱着筆者作為一位留日中國人的個人體驗，但這種個人體驗應當具有普遍性。

## 一 留日者的尷尬

甲午戰爭失敗後的1896年，中國人開始留學日本。這意味着留學伊始，他們就必須作為戰敗國的子民，承受日本人帶有侮辱性的、居高臨下的目光。因此，早期留日學生去上野公園遊玩，也會有日本兒童追着喊「豬尾奴」<sup>②</sup>。這種對中國人的蔑視通過新聞媒體表達出來，成為來自日本知識界的聲音，於是，陳天華在1905年12月8日為抗議日本人的侮辱、為警醒國人而蹈海自殺。

大約是因為這個頭開得太「晦氣」，所以自此以後，中國留日學生的際遇與命運實在讓人「不知說甚麼好」。姑舉幾例。向愷然，清末民初兩

次留學日本，結果在其開中國留學生文學先河的長篇巨著《留東外史》中，將日本罵作「賣淫國」，將日本人稱作「日本小鬼兒」。日本入侵中國後，他給自家養的一條狗取名「甲板」(Japan)，不僅自己投身抗日戰爭，並且送兒子去當空軍，要和兒子一起在空中、地面與日本人進行「立體作戰」<sup>③</sup>。幾乎與向愷然同時留學日本的周作人，娶日本女性為妻，熱心向中國介紹日本文化，幾乎成為中國第一知日文人，結果是日本人使他不清不白地成了「漢奸」。郭沫若，留學日本並與護士小姐佐藤富子結婚生子，結果蘆溝橋槍聲一響，他投筆請纓、別婦拋雛，穿着睡衣從市川的住所逃出，回國抗日去了。郁達夫，留學日本，在日本寫出名作《沉淪》，頗受日人敬重，但在抗戰開始不久，他卻寫出了〈日本的娼婦與文士〉<sup>④</sup>那樣尖刻、激烈的文章。抗戰勝利時他遠在南洋的蘇門答臘，卻未能逃脫日本的魔掌，他被活活掐死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位天才作家的雙腳該是如何痛苦地抽搐……。留日中國人與日本的關係實在不應當是這個樣子，但又確確實實是這個樣子。

向愷然在其開中國留學生文學先河的《留東外史》中，將日本罵作「賣淫國」、將日本人稱作「日本小鬼兒」。日本入侵中國後，他給自家養的一條狗取名「甲板」，不僅自己投身抗日戰爭，並且送兒子去當空軍，要和兒子一起在空中、地面與日本人進行「立體作戰」。

上面這些事實，應當能夠提醒我們注意不同時代留日中國人的生存方式與話語形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因為〈雙語困惑〉一文提及的《日本經濟新聞》上的文章，指出了魯迅、郭沫若那一代留日中國人與新時期旅日中國人的區別：「前者用中文表達，後者用日語撰稿」云云。〈雙語困惑〉的作者毛丹青對「日語撰稿」之「潛台詞」的閱讀是敏銳的，但似乎還有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沒有被讀出來，那就是語言的選擇對價值觀的影響。

## 二 說給誰聽與說甚麼

人的本質是語言，因此可以把「人」定義為「語言的動物」。語言作為一種歷史和文化的載體，塑造着人這種動物的每個方面。日本人在對台灣和舊滿洲殖民統治期間運用各種手段推廣日語，甚至把日語定為「滿洲國」的國語，實在是頗具「歷史眼光」的文化陰謀。在這個意義上，母語就是「自我」，用母語進行表達是人作為人的最大自由。而且，母語無法逃避，試圖逃避母語就像試圖在陽光下逃避自己的影子。如果你明明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普通話說得很標準，但你為了表示自己的「東洋化」或「西洋化」或「南洋化」，而刻意把漢語說得結結巴巴，那麼你「一不小心」就會把漢語說得很地道。

既然如此，選擇用外語來表達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着對語言自由的放棄、意味着話語權的被剝奪。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語言的自由、用外語來表達，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因為對方不懂敘述者的語言，而敘述者為了表達自己，只有使

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語言。比如中國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自配英文翻譯，讓不太熟悉漢語的各國記者領會新聞發言人的發言，就屬於這一種。另一目的是對傾聽者有所期待、試圖在傾聽者那裏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只有用對方的語言來表達。比如一個離開中國來到歐美或日本的中國人，為了獲得這個陌生世界的承認，便只有使用這個社會共有的語言。於是，英語或是日語就成為其進入歐美社會或日本社會的第一條通道。所以，當某些旅日中國人為在日華人的日文著述而「自豪」的時候，毛丹青尖銳地指出：「他們用日文著書大部分是為了滿足日本的輿論需求，別無更深的理由」，確實很有必要。

不過，為了在異國生存、實現自己的價值而用外語著述，這一文化行為還潛藏着更大的危險性，這就是價值觀之獨立性的喪失。為了獲得對方的承認而使用對方的語言，也不免屈從甚至迎合對方的價值觀與趣味，敘述者價值觀之獨立性由此受到威脅。當敘述者價值觀之獨立性喪失殆盡的時候，寫作便會流於「文化的諂媚」。

敘述者在這種「外語寫作活動」中的「自我」變異與對傾聽者的諂媚，首先表現在旅歐旅美華人的英文著述中。在大陸引起反響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sup>⑥</sup>中，作者尖銳批評了鄭念的《上海生與死》、張戎的《鴻》等華人英文暢銷書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妖魔化」——比「醜化」更可怕的「妖魔化」。該書指出：

這些寫給美國讀者看的書，必須要照顧到根本沒有經受過「文革」苦難的美國人的趣味。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那麼多的苦難和悲傷，寫成能夠賺取美

為了在異國生存、實現自己的價值而用外語著述，潛藏着價值觀之獨立性的喪失。這種「外語寫作活動」中的「自我」變異與對傾聽者的諂媚，首先表現在旅歐旅美華人的英文著述中。鄭念的《上海生與死》、張戎的《鴻》等華人英文暢銷書，比「醜化」更可怕地「妖魔化」了中國和中國人。

國讀者同情的眼淚和好奇心的感人故事。結束時，更要讓讀者感受到一點，就是「還是生活在美國幸運，美國是多麼偉大啊」。

實際上，那種對西方社會近於自輕自賤的諂媚，正是以「用英文寫作」這個事實為前提和起點的。他們的「話語王國」淪為英語殖民地，他們在成為「英語」的「順民」的同時，亦成為英語社會價值體系的屈服者。

那麼，這種「外語寫作活動」中敘述者的「自我變異」，在旅日中國人的日文著述中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雙語困惑〉一文提及的199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某旅日中國人博士在《朝日新聞》上發表的所謂〈中國也要自省〉的文章就是一例。中國當然要反省，而且這種反省多年來一直持續着。搞四個現代化、甚至搞核試驗，都可以說是基於這種反省、基於對「落後就要挨打」這一慘痛歷史教訓的汲取。但是，這種「反省」決不是作為曾經給亞洲社會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所應當作的那種「反省」。在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之際，作者將這兩種反省相提並論，無疑是混淆了作為「反省」之前提的完全不同的歷史事實（加害與被害），並且迴避了歷史判斷中的道德判斷。如果我們注意到這篇文章是用日文寫的、而且是發表在《朝日新聞》這種在日本社會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報紙上，那麼作者的寫作動機就一目了然。毛丹青將其解釋為「並無惡意，只希望中國能夠自強」，未免流於簡單與善良，因為那篇文章並不是寫給使用漢語的中國人看的。

比某博士的文章更應引起注意的，是沈潔博士的《「滿洲國」的社會事

業史》。該書是著者的博士論文，1996年由京都のミネルヴァ書房出版後，引起日中兩國學界的反響。1996年10月27日，著者在東京的巢鴨社會教育會館作了題為「《「滿洲國」的社會事業史》寫作出版經過」的演講。著者說：「我把在『滿洲國』實施的殖民地社會事業區分為文化性社會事業和政治性社會事業，從文化性社會事業的角度給民間層次或者個人層次的救濟活動給予適當評價。我覺得在至今尚未解決的殖民地問題、日中戰爭問題中缺乏實證的、冷靜的態度，沒有不僅追究過去的歷史責任、而且面向未來的新觀點」；「究竟應當怎樣把握歷史實象？生活在『滿洲國』的人們的真象是怎樣的？很久以來我苦於介紹這些問題的反覆思索中。」這裏無暇介紹那本厚三百餘頁的專著，但讀者從著者上述自白中，大致可以了解那本書的內容。著者確實認真的考察了日本殖民主義者在「滿洲國」實施的社會事業。據著者說，已經有人批評該書是美化日本殖民主義者的侵略行為<sup>⑥</sup>。筆者深有同感。因為書中關於日本在「滿洲國」實施醫療衛生事業等的介紹，使筆者想起了1995年10月日本前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的發言——所謂「日本在統治韓國期間為韓國建了釜山港、仁川港和五千多所學校」。但由於韓國人強烈抗議，江藤被迫辭職<sup>⑦</sup>。

筆者的專業並非歷史學，亦非社會福利事業史，但從歷史常識出發，筆者認為有兩個與《「滿洲國」社會事業史》的邏輯起點密切相關的前提性問題應當討論。第一，對於當年生活在「滿洲國」的中國人來說，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存在過正面意義上的「社會事業」？楊靖宇、731部隊、萬寶山事件等姑且不論，恰好在聽了沈博士的

在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某旅日中國人博士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中國也要自省〉的文章。作者將中、日兩種反省相提並論，無疑是混淆了作為「反省」之前提的完全不同的歷史事實（被害與加害），並且迴避了歷史判斷中的道德判斷。

講演一周後的11月3日，筆者在NHK（相當於中國的中央電視台）看到了介紹出生在舊滿洲的日本名演員森繁久彌的專題節目：《遙遠的青春之地》。從那個專題節目對曾經生活在「滿洲國」的東北老人的採訪中，我得知日本人在當年「滿洲國」的地位最高（所謂「大太君」），朝鮮人次之（所謂「二太君」），中國人則最低。沈博士專著中的某些統計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有關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滿洲國」對殺的慘劇，日本電視台也不只一次作過介紹。第二，在日本國的國民作為一個群體對中國進行侵略的時候——滿洲開拓團本來是一種「國家行為」，「民間層次或者個人層次的救濟活動」如何從國家的侵略行為中區別出來？意味着甚麼？歷史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尋找個別性而是尋找普遍性，把個人完全等同於國家或者把個人從國家中完全分離出來，同樣是歷史唯心主義。

著者自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把長期以來被中日兩國研究者置之不顧的『敏感』課題發掘出來，在對歷史事實進行疏理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解明」<sup>⑧</sup>，但是，如果不是置身日本的社會環境，如果不是以日本人讀者為對象而用日語寫作，那麼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大概會是另一種情形<sup>⑨</sup>。

問題依然是「日文撰稿」。

其實與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那一代留日中國人相比，當前留日中國人用日文著述，未必完全是喜劇——雖然也未必是悲劇。向愷然大約不會用日文寫《留東外史》，郁達夫大約不會用日文寫《日本的娼婦與文士》，因為那樣的話，他們便很難擁有自己的「讀者」。這大概也是毛丹青所謂的「雙語困境」之一種吧。

與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那一代留日中國人相比，當前留日中國人用日文著述，未必完全是喜劇——雖然也未必是悲劇。向愷然大約不會用日文寫《留東外史》，郁達夫大約不會用日文寫《日本的娼婦與文士》，因為那樣的話，他們便很難擁有自己的「讀者」。

### 三 唱好「中國戲」

但是，對於毛丹青有關在日中國人大唱「中國戲」的批評，我卻不以為然。相反，我認為在日中國人應當大唱中國戲，唱好中國戲。

對事物的認識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自知」，二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他知」。不過，這兩種「知」各有其局限性。因此，第三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知」，可算是真正的「知」。在中國出生、在中國成長、對「中國」有切身體驗的中國人，當他們走出中國並置身於新的社會環境與價值體系之中，然後再回首看中國，應當是「恍然大悟」或者「感慨良多」的。僅舉一例。費孝通的名著《江村經濟》，似乎就是著者留學時期在國外「唱中國戲」的成果。「研究」與「研究對象」並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說完全是兩回事，這是因為「研究」（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持某種價值觀與「研究對象」進行對話。正是由於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持有其獨自的價值觀，他們的研究才對中國學者富有啟發性。據筆者所知，在日本大學專攻中國學（歷史、哲學、文學等）的中國學生，常受到日本人不友善的詢問：「中國人為甚麼要到日本來學習中國學？」這無疑是出於詢問者認識論上的幼稚。

從幫助日本人認識中國的角度看，在日中國人「唱中國戲」也是有必要的。在日本是否了解中國這一問題上，我與毛丹青的看法不同：日本未必了解中國。正像傑出的日本學者野村浩一指出的：「日本近代史是在認識中國這一問題上失敗的歷史，而且不能說這種歷史已經結束。」<sup>⑩</sup>政治家關於戰爭問題的「失言」、釣魚島爭端、

遺留化學武器的處理、正在日本社會蔓延的對中國人的歧視與仇視<sup>①</sup>，都不妨看作是這種「不了解」的表徵。那麼，誰來向日本傳達中國？日本中國學會的約兩千名會員正在辛勤地工作着（中國人應當感謝他們），但那永遠是一種「日本人表達」，被表達的是一種「旁觀者清」的「知」。而且，如果個別研究者對中國和中國人持有偏見，那麼其偏見在日本社會的傳播只能加深日本人對中國的誤解和蔑視。比如有日本學者受美國人的影響而研究中國的人種歧視思想，把西藏解放稱作「以『解放』為名義的種族歧視」<sup>②</sup>（按照這種邏輯，西藏解放前的農奴制將成為「人權制」）。因此，中國人在日本唱中國戲，「現身說法」，用日語向日本社會傳達「中國」，就是有需要的。關鍵依然是「雙語困境」。如何在使用別人的語言時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不致讓自己的話語形式成為外語（及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們）的殖民地，進而把外語「工具化」，使外語成為自己支配的「殖民地」……這些問題。實在值得深思。筆者有幸看到《留學生新聞》等華文報刊都設了日文專頁，認真向日本傳達着中國。這是可喜的現象。朱建榮先生在電視專題節目中用日語向日本人傳達中國人對兩岸關係等問題的認識，也是很有必要的。

當然，筆者並不反對甚至贊成毛丹青關於在日中國人應當唱「日本戲」的主張。正像日本人常說的：中國與日本是這樣近又是這樣遠。大約是因為同樣是黃面孔、同樣使用漢字，這兩個差異性很大的民族才那麼容易誤解對方吧。看似「同文同種」，其實性格各異。中國和日本太需要互相了解。但中國人如何在日本唱「日本戲」，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 註釋

① 毛丹青：〈旅日中國學者的雙語困惑〉，《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號，頁135-37。

② 實藤惠秀：《中國留學生史談》（東京：第一書房，1981），頁57。

③ 向一學：〈回憶父親一生〉，《江湖奇俠傳》（長沙：岳麓書社，1986），附錄。

④ 郁達夫：〈日本的娼婦與文士〉，《抗戰文藝》，第四期，1938年5月14日。

⑤ 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⑥ 以上見講演稿，原文為日文。載《日本僑報》，1996年12月1日，第五號。

⑦ 被迫辭職後的江藤隆美並不認錯，並在1996年初的新年懇談會上重申自己的觀點。參見〈江藤氏說：「沒有必要反省」〉，《朝日新聞》，1996年1月5日，第12頁。

⑧ 沈潔：《「滿洲國」的社會事業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頁3。

⑨ 聽講演的時候筆者曾問講演主持人段先生：「這本書是否已在大陸出了中文版？」段先生說：「大陸恐怕不會出版這本書吧……。」這耐人尋味。

⑩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東京：研文出版，1981），頁47。

⑪ 據1997年夏的一份調查，當時對中國懷有好感的日本人只有14%，與二十年前中日恢復邦交時的55%形成巨大反差。參見張一帆：〈日本的「中國熱」為何退潮——訪眾議院議員福田康夫〉，《時報》（東京），1997年7月號。

⑫ 坂元ひろ子：〈以「解放」為名的種族歧視〉，《世界》（東京），1996年第3期。

從幫助日本人認識中國的角度看，在日中國人「唱中國戲」也是必要的。不然，誰來向日本傳達中國？但那永遠是一種「日本人表達」，被表達的是一種「旁觀者清」的「知」。當然，筆者也贊成毛丹青關於在日中國人應當唱「日本戲」的主張，但中國人如何在日本唱「日本戲」，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董炳月** 北京大學畢業。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責任編輯，1992年晉升副研究員。1994年留學日本，現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攻讀博士學位。